

## 想像的歸隱——從隱逸散曲傳統

### 論明末士人張炳璿的套曲

蔡淑閔\*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 摘要

張炳璿(1587—1661)，字儀昭，號郟庵，陝西涇陽人。他的父親是張鑑，為關中理學名儒，明末著名的天主教徒王徵是他的表哥。史稱張炳璿「尤工樂府」，目前現存他兩套套曲：〈和王良甫山居詠〉與〈村居即事〉，皆與王徵購地隱居「簡而文」有關。兩套曲皆是唱和明中期散曲大家王九思的〈歸興〉與〈春遊〉，其主題皆是「隱逸」，描寫鄉居的閒適生活，曲中充滿著仕與隱的對照。張炳璿以「和韻」中詩藝最高的「次韻」來唱和，除了表達對王九思的尊崇外，也抒寫了個人的遭遇與情志。他透過唱和，模仿、學習王九思曲作來製作套曲，與王徵兩人互相切磋，也增進彼此的情誼。創作的目的除了自娛外，也想達到「臥遊」的目的。他創作時年已四十九，仍在為科考努力，曲中表達了「詩書債苦」，試圖掙脫名利的束縛，並以村居生活來排遣長期舉業不第的失落。他亦步亦趨王九思的作品，曲作風格平淡自然，在人物意象與情感思想的描寫上遵循隱逸散曲的傳統，充分展現隱逸散曲的風致，雖然繼承有餘而創新不足，但在衰微的晚明散曲史上，尤其是關中散曲史，仍有其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張炳璿、詩書債苦、想像的歸隱、隱逸散曲

---

\*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多所指正，使本文更臻完善，謹此致謝。



## **Imaginary Withdrawal: On the Taoqu of Zhang Bingxuan, a Scholar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from the Tradition of Hermitage Sanqu**

**Tsai, Shu-Min**

### **Abstract**

It was said in history that Zhang Bingxuan(1587-1661) was good at creating "Yuefu", and two of his taoqu were still in existence: "He Wang Liangfu shan ju yong" and "Cun ju ji shi". It was all related to Wang Zheng's purchase of land to live in seclusion. The two sets of toqu were both responded to Wang Jiusi's "Guixing" and "Chunyou", a master of sanqu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The theme of the pieces was "hermitage", describing the leisurely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and were full of contrasts 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the hermit. In addition to self-entertainment, the purpose of creation is also to achieve "spiritual travel". He was forty-nine years old at the time of his creation and was still working hard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 toqu expressed the suffering of poetry and book debts, trying to break 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fame and fortune, and using village life to relieve the loss of long-term examination failures. He followed closely the works of Wang Jiusi. The style of the toqu was plain and natural, and in the description of character images and emotional thoughts, it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hermit Sanqu, and fully demonstrated the style of hermit Sanqu. Although there was more inheritance than innovation, it also had meaning and value in the declining history of Sanqu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history of Sanqu in Guanzhong.

**Key words: Zhang Bingxuan, Suffering of poetry and book debts, Imaginary Withdrawal, Hermit Sanqu**



## 一、前言

張炳璿（1587—1661，明萬曆十五年至清順治十八年），字儀昭，號邳庵，陝西涇陽人。他的父親是張鑑（1545—1605），為關中理學名儒。<sup>1</sup>明末著名的天主教徒王徵（1571—1644）是他的表哥，兩人從小在張鑑的門下讀書，再加上住在同里社，關係親密。史稱張炳璿善屬文，長於詞賦。崇禎十二年（1639）以貢士身分授滿城知縣。才一年就撫綏有方，邑稱大治。但因個性清介不合於時，於是罷歸杜門著書，晚年尤工樂府。<sup>2</sup>李自成（1606—1645）攻陷西安時（1644）徵召他做官，他不從，乃告別妻子，並以詩明志。著有《邳庵集》二十卷、《山居詠和》一卷。<sup>3</sup>

史稱張炳璿「尤工樂府」，在盧前（1905—1951）的《飲虹榭所刻曲》<sup>4</sup>與謝伯陽編的《全明散曲》中僅收錄他的兩套套曲：一套是唱和表哥王徵〈山居自詠〉套曲一唱和王九思（1468—1551）〈春遊〉套曲一的〈表兄王良甫先生買樊川之濱，費省而地勝，字曰簡而文，依碧山樂府春遊韻美之，予亦為之心賞，願與卜鄰，因效顰焉〉（以下簡稱〈和王良甫山居詠〉），另一套是唱和王九思〈歸興〉套曲的〈村居即事〉。<sup>5</sup>對於張炳璿與王徵的套曲，時人梁爾壯（生卒年不詳）<sup>6</sup>云：「（王徵）且與至戚張儀昭丈讀書琴奕，暇日撰樂府詞曲數闕，以寄寓情志。」<sup>7</sup>他這樣評價他們的曲作：

兩公深諳律呂，頡頏今古，更唱迭和，並驅中原。我關中百年前，德涵、敬

<sup>1</sup> 張鑑，字孔昭，號湛川。隆慶間（1567—1572）恩貢。初授趙城縣知縣，補遷安，升太原府同知。督餉偏頭關，勤能有聲，加河東運司。歷官二十年，布衣蔬食，如寒士。私諡「貞惠」，祀鄉賢。《咸陽經典舊志稽注》編輯委員會編：《清宣統·重修涇陽縣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咸陽經典舊志稽注》，頁320。

<sup>2</sup> 同上，頁331。

<sup>3</sup> 謝伯陽編：《全明散曲》（濟南：齊魯書社，1994），頁3558。

<sup>4</sup> 盧前輯：《飲虹榭所刻曲》（臺北：世界書局，1961）。

<sup>5</sup> 王徵有唱和張炳璿〈村居即事〉之〈同春園即事〉套曲，收錄於《全明散曲》，頁3446—3447。

<sup>6</sup> 梁爾壯，字君陽，邑廩生。講學高節，建「平憾堂」，以養疲癯殘疾。後自嫌近名，改關壯。繆廟嘗立孝義會，出粟五百石，備婚喪公事之助。設「他山館」，受經數百人。又修城、補橋、鑿渠、築堰、屢賑饑、代完賦，家產殆盡。教子鉉（順治八年進士）成名，鉉後為倉場侍郎。《咸陽經典舊志稽注》編輯委員會編：《清光緒·三原縣新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頁244。

<sup>7</sup> 梁爾壯：〈簡而文小引〉，《全明散曲》，頁3449。



夫特妙聲調，與西蜀用脩<sup>8</sup>賡響振籟，後來久輟，兩公足繼芳躅。<sup>9</sup>

「德涵」、「敬夫」分別是康海（1475—1540）、王九思的字，他們是明代中期的散曲大家。康海是陝西武功縣人，王九思是陝西鄠縣人，王徵、張炳璿則是陝西涇陽縣人，四人同是關中地區的曲家。梁氏從關中散曲發展史的角度來定位王徵、張炳璿的曲作，他認為二人的曲作可以繼承康海與王九思，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sup>10</sup>

在中國散曲史上，「隱逸」一直是重要的內容題材，主要描寫文人退隱後的鄉居閒適生活。<sup>11</sup>無論是王九思的〈歸興〉、〈春遊〉原作，還是王徵、張炳璿的和作，其主題很一致的都是「隱逸」。古代的知識份子在社會的期待與人生的價值中，試圖通過科舉取士，進入官場，去實現兼善天下的理想，但常因科舉中第的不易，始終在落第與備考、應考的循環中；即使好不容易中第進入官場，也常因種種因素，被迫離開，回到故鄉。王九思與王徵屬於後者，張炳璿則是前者，他在撰寫曲作時還在為科考努力。本文試圖以文本分析法與文獻分析法，<sup>12</sup>從隱逸散曲的傳統題材來分析張炳璿的兩套套曲，將其內容分成兩部分：「詩書債苦的科考生涯」與「暫拋舉業的村居生活」來看他套曲中的「隱逸」，以見他曲作中所呈顯的生命情態，並定位其曲作的意義與價值。

<sup>8</sup> 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四川新都縣人，祖籍江西廬陵，為內閣首輔楊廷和（1459—1529）之子。正德六年（1511）狀元，官至翰林院修撰。大禮議事件中，因率領百官在左順門求世宗改變皇考，而貶謫雲南，終老於戍地，一生未獲赦免。後追贈光祿少卿，謚號文憲。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中國學術類編》），卷一九二，頁5081—5083。

<sup>9</sup> 梁爾壯：〈簡而文小引〉，《全明散曲》，頁3449。

<sup>10</sup> 劉英波亦從關中散曲史的角度來討論王徵與張炳璿的曲作，他認為：「他們的散曲創作中表現出了承傳、自娛、創新的特點，仍有可觀之處，這主要表現在他們的創作散曲主動向前代關中曲家王九思學習，以及在書寫自娛情懷時對天主教教義的加入」，所以他們的散曲創作「在關中散曲史上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和價值，在明代散曲史上也有自己的獨特之處。」《明代『吳中』『關中』散曲史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頁162—166。另外，關於張炳璿曲作的研究，以筆者所見，僅此一篇。不過，劉氏的討論多集中在王徵，張炳璿則相對較少。

<sup>11</sup> 趙義山：《二十世紀元散曲研究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111—116。

<sup>12</sup> 「文本分析」是將一個文學作品拆解開來，觀察拆解出來的文學作品之中，其部分與部分之間的關係如何拼湊在一起，並透過一些知識傳統相連的價值進行詮釋文本的工作。Berger, Arthur Asa, *Cultural Criticism: A Primer of Key concept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5).



## 二、「詩書債苦」的科考生涯

張炳璿的兩套套曲：〈和王良甫山居詠〉和〈村居即事〉的寫作時間大致相近，都與王徵購地興建隱居的居所——「簡而文」有關，<sup>13</sup>〈和王良甫山居詠〉的寫作時間應該比較早。王徵的套曲根據宋伯胤的研究大約作於崇禎八年（1635），<sup>14</sup>因此張炳璿的曲作，應該也是作於同時。崇禎十二年（1639）他才擔任滿城知縣，所以這時的他還沒有出仕，仍然在為舉業奮鬥，是閑居在家的。〈和王良甫山居詠〉是他唱和王徵的〈山居自詠〉套曲，他因為「俗冗勞牽」，其實並未見過「簡而文」的勝景，而是聽王徵稱說的，他道：

古人有臥遊者，有夢遊者，其遊不一。予所嚮往，乃從良甫稱說中來，故予之遊，今直謂之耳遊可耳。夫以雙荷葉貯此清境，卻借小詩率爾寫照，初耳代目，既手代耳，轉轉失真，敢謂摩詰詩中有畫，山靈定嗔予之傳疑。然寫照正不期對形索肖，予即刻畫未工，譬猶增頰上三毛，不更使終南太乙精神頓王邪。<sup>15</sup>

「臥遊」是指以欣賞山水畫、遊記等來代替遊覽，<sup>16</sup>「夢遊」則是在夢中遊覽，而張炳璿對於「簡而文」則是「耳遊」——耳聽王徵稱說的遊覽。至於他寫這套套曲的目的是欲借此來「寫照」簡而文的清境。一開始他是以耳代目，寫套曲又以手代耳，雖然會輾轉失真，但他認為「寫照」是不求完全相似，即使他刻劃未工，也能寫出些許風采。由此看來，他的目的除了唱和自娛之外，也想使人透過此曲欣賞「簡而文」的勝景，達到「臥遊」的目的。至於〈村居即事〉，則是寫了〈和王良甫山居詠〉後，他發現到：「余家堯門之下，清水繞前，翠峨屏後，溪草林花四時都媚。乍到者豔之者為天然福地。遠慕終南，而近不表村居之勝，亦缺事也。」<sup>17</sup>也就是

<sup>13</sup> 崇禎八年（1635），王徵買山於樊川之濱，作為歸隱處，他撰有〈簡而文自記〉一文，詳細記載購地的經過以及周邊的風光。明·王徵：〈簡而文自記〉，《王徵全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卷二十二，頁341—342。

<sup>14</sup> 宋伯胤根據梁爾壯寫於崇禎八年（1635）七月的〈簡而文小記〉，定王徵的三套套曲：〈山居自詠〉、〈山居再詠〉和〈同春園即事〉是崇禎八年七月前的作品。見宋伯胤：《明涇陽王徵先生年譜》（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77—78。

<sup>15</sup> 張炳璿：〈耳遊簡而文小詠有引〉，《全明散曲》，頁3563。

<sup>16</sup> 關於明人「臥遊」的研究，可參考曹淑娟：〈晚明文人的休閒理念及其實踐〉，《戶外遊憩研究》第4卷第3期（1991年9月），頁35—63。陳忠和：〈晚明山水小品中遨遊型態與臥遊型態的真偽辨析〉，《興大人文學報》第36期（2006年3月），頁283—324。葉國良：〈中國文學中的臥遊——想像中的山水〉，《政大中文學報》第13期（2010年6月），頁177—193。

<sup>17</sup> 張炳璿：〈村居即事〉，《全明散曲》，頁3561—3562。





自家周邊的環境亦為天然福地，於是透過唱和王九思的〈歸興〉套曲描寫自己村居的勝景與生活，並邀請王徵唱和。因此，他寫作的動機除了標榜自家勝景之外，或許也有讓人「臥遊」的目的。

王九思的〈歸興〉是他被貶官勒令致仕回鄉不久後的作品，宮調是「雙調」，由九支曲子組成。內容主要描寫他在碧山下的閒適生活，而這生活是與過去官場的忙碌與險惡對照的。他曾進士及第，官至吏部郎中，因此套曲中有「青錢萬選才」、「黃閣三公大」之語，而如今在山川勝景、美酒、詩樂與美女歌舞的陪伴中渡過他的隱居生活。<sup>18</sup>至於王徵的〈山居自詠〉套曲是唱和王九思的〈春遊〉套曲，<sup>19</sup>宮調是「正宮」，由十九支曲子組成。內容主要描寫他在「簡而文」的隱居生活，並回顧過去擔任推官以及後來監遼海軍務，發生兵變，出死入生的官場生活。至於他的隱居生活，除了與一般文人相同的與詩酒歌樂相伴外，特別的是，他過的是天主教徒的清修生活，因此套曲中充滿著天主教的術語。<sup>20</sup>這兩套套曲的內容都是描寫退下官場的閒適生活，曲作中充滿著官場與隱居生活的對比。

張炳璿沒有實際的做官經驗，他在套曲中所呈現與隱逸對照的「官場」，多就是普遍意義的名利相爭、富貴榮華、英雄功業轉瞬即逝的現象來描寫：

〔滾繡球〕想著那曲江外塚滿渠，午橋莊草滿居，件件是傷心景物，撥不就  
算盤子加減乘除，杖頭錢到處沽，樹頭鶯鎮日呼，休錯認買山題目，笑世上  
幾多人掙脫塵俗，不愁蠶織千重繭，單想雷騰大壑魚，眼睜睜曳尾臨廚。

〔五煞〕慣馳驅電影飛，報冤仇虹氣粗，英雄多少難遭遇，鳴鷄賺出函關月，  
擊筑歌殘督亢圖，一失腳無生趣，再看那長陽五柞，都估了露草煙蕪。<sup>21</sup>

「曲江」是長安城的著名景點，「午橋莊」為唐朝宰相裴度（765—839）的別墅，「長陽五柞」是漢武帝（前156—前87）的宮殿，如今皆是繁華落盡，呈現衰敗的景象。物是如此，人亦是，無論是「鳴鷄賺出函關月」的祖逖（266—321），還是

<sup>18</sup> 王九思：〈歸興〉，《全明散曲》，頁940—941。

<sup>19</sup> 〈春遊〉描寫的是王九思到友人的「藏春塢」，在春遊途中的所見所感，內容仍是官場與隱居生活的對照。王九思：〈春遊〉，《全明散曲》，頁941—944。

<sup>20</sup> 王徵：〈山居自詠〉，《全明散曲》，頁3440—3443。關於王九思與王徵這幾套套曲的研究，可參考拙著：〈失落與轉化——從王徵唱和王九思套曲比較二人之仕隱生活〉，《遠東通識學報》第31期，2023年1月，頁27—51。

<sup>21</sup> 張炳璿：〈和王良甫山居詠〉，《全明散曲》，頁3558—3560。



「擊筑歌殘督亢圖」的荊軻（？—前 227），皆是「一失腳無生趣」，皆是「傷心景物」、「夢裡繁華」。其間的利弊得失是無法算得盡的，然而人們仍想當「雷騰大壑魚」，以為是自由自在的曳尾塗中，卻不知是臨廚遭險，所以有多少人能超脫名利呢！

由於唱和的關係，張炳璿也寫到做官以及爭名奪利的擾攘，如：「〔駐馬聽〕鬢點霜華，得失年來如塞馬，鞭飛曦駕，鬧攘幾陣似蜂衙，忘機纔與海鷗狎，調琴惹得鸚哥罵。」還有「〔沽美酒〕想著那鼓鞳鞳放曉衙，筆豔豔吐春葩，奪利爭名撩亂殺，笑癡聾啞，無人敬無人怕。」<sup>22</sup>無論是「鬧攘幾陣似蜂衙」或是「鼓鞳鞳放曉衙」皆是官場的實景，他並未進入官場，不過透過觀察、想像與模擬，仍能寫出在官場上爭名奪利的奔波忙碌景象。當然，作為一個傳統的讀書人，他也有兼善天下的理想：「〔上小樓〕我也要青山射虎，彤庭振鷺，袞補山龍，柱砥崑崙，職效工虞。」而且「〔么〕誰不想位登五府，身居要路，喚雨呼風，迴天轉日，鬼使神驅。」<sup>23</sup>但不是人人都能如此，倒不如鄉居生活自在：「〔得勝令〕且隨緣白帽耐烏紗，又何須宮錦下黃麻，瓦鉢子滋味比金罽，蹇衛兒平安遇駿馬，江上語琵琶，不如把玉簫聲閑吹罷，紙上染雲霞，不如把輞川圖閑玩咱。」<sup>24</sup>這裡，我們仍看到做官與隱居的對照，對他而言，隱居的逍遙自在是勝過做官的。

特別的是，張炳璿在曲作中提到「詩書債苦」：準備科考、讀書寫文章的辛勞，這是他目前正在面對的，也寫得較深刻。〔脫布衫〕曰：「你縱然唾花飛早探驪珠，綵毫揮晚醉氈氍，蕉鹿夢依然嚙語，菘蕩針幾曾拾住。」<sup>25</sup>前兩句皆是指寫文章，他認為縱然寫得再高妙，也依然是「蕉鹿夢」和「菘蕩針」，是虛幻而無法抓住的。〔沉醉東風〕也曰：「說甚麼一丈石醉叩天涯，說甚麼八斗才詞倒三峽，酒淹了金縷衣，露漬透凌波襪，大都來夢裏繁華，兀的朱門那幾家，把一個小膽的人兒誑殺。」<sup>26</sup>即使像曹植（192—232）「八斗才詞」能倒三峽，還是〈金縷衣〉與〈洛神賦〉等有名的文學作品，都只是過眼雲煙。所以他在〔滿庭芳〕一曲中說道：

詩書債苦，西藏充棟，丙夜傳壺。從前悔墮漫天霧，羹粥聊娛，事業埒當筵

<sup>22</sup> 張炳璿：〈村居即事〉，《全明散曲》，頁 3561—3562。

<sup>23</sup> 張炳璿：〈和王良甫山居詠〉，《全明散曲》，頁 3558—3560。

<sup>24</sup> 張炳璿：〈村居即事〉，《全明散曲》，頁 3561—3562。

<sup>25</sup> 張炳璿：〈和王良甫山居詠〉，《全明散曲》，頁 3558—3560。

<sup>26</sup> 張炳璿：〈村居即事〉，《全明散曲》，頁 3561—3562。



童殺，箕裘冷羅雀門閭，丟去也從頭做，約幾個歸山伴侶，抱膝向茅廬。<sup>27</sup>

前三句都是指求學的辛苦，「蠶粥」指范仲淹（989—1052）早年求學讀書時，因家境貧苦，每天以二升粟煮粥，過夜凝結後，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食二塊，再切一些醃菜佐食。<sup>28</sup>後來用以形容刻苦勤學。張炳璿認為這也只能「聊娛」，事業、箕裘不一定會如同預期，所以倒不如與歸山伴侶回鄉歸隱來得自在快活。

根據學者的研究，明代中後期隨著全國人口總數的增加、經濟的發展，受教育的人口也大幅增加，<sup>29</sup>雖然生員的配額逐漸放寬，但科舉進士的名額並未增加，憲宗成化乙未年（1475）以後，幾乎維持每三年錄取三百名進士的定額。<sup>30</sup>對於科舉考試的困難，文徵明（1470—1559）曾言：「吾蘇一郡……以千五百人之眾，歷三年之久，合科貢兩途，而所拔才五十人。」<sup>31</sup>即蘇州地區每一生員在三年之內可以成為貢生或舉人的成功率僅有三十分之一。胡直（1517—？）亦言：「直常偕君試南宮，凡就試者不下三四千人，此三四千人者，始嘗登等於數萬人，已而得對大廷者止三百人。」<sup>32</sup>會試考試的錄取率約十分之一，相形之下，鄉試考試更難。張炳璿擔任滿城知縣時年已五十三，創作套曲時年四十九，從事舉業至少三、四十年以上。他面對這麼漫長的舉業生涯，常在備考、應考與落第之間循環，難免會產生不如歸去之歎，所以在曲作中高舉隱居的價值，羨慕王徵在「簡而文」的生活。只是他這「不如歸去」不是離開實際官場去隱居，也不是完全掙脫名利、科考的枷鎖，而是暫時躲避傳統讀書人的社會期待與人生目標——科舉中第做官——這唯一的價值。對古代的讀書人來說，求學仕進是他們的人生目標，仕宦之路也是他們兼善天下的主要方式。從年少開始，他們把全部的精力投注於此，不屈不撓，但在僧多粥少的

<sup>27</sup> 張炳璿：〈和王良甫山居詠〉，《全明散曲》，頁 3558—3560。

<sup>28</sup>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四部叢刊》），卷七，頁 5b—14a。

<sup>29</sup> 何炳棣著，徐泓譯注：《明清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 223。

<sup>30</sup> 《明史·選舉志》記載：鄉試之額，洪武十七年（1384）詔不拘額數，從實充貢。洪熙元年（1425）始有定額。其後漸增。至正統間（1436—1450），南北直隸定以百名，江西六十五名，他省又自五而殺，至雲南二十名為最少。嘉靖間（1522—1566），增至四十，而貴州亦二十名。慶、曆、啟、禎間，兩直隸益增至一百三十餘名，他省漸增無出百名者。會試之額，國初無定，少至三十二人，其多者，若洪武乙丑（1385）、永樂丙戌（1406），至四百七十二人。其後或百名，或二百名，或二百五十名，或三百五十名，增損不一，皆臨期奏請定奪。至成化乙未（1475）而後，率取三百名，有因題請及恩詔而廣五十名或百名者，非恒制也。張廷玉：《明史》，卷七十，頁 1697。

<sup>31</sup> 明·文徵明：〈三學上陸冢宰書〉，《甫田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二十五，頁 3a—7a。

<sup>32</sup> 明·胡直：〈別諸南明太史歸越序〉，《衡廬精舍藏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八，頁 18a—20a。





情況下，科舉卻日益困難，即使中第做官了，往往因種種原因而被迫離開，尤其是外在的政治社會情勢影響最大。張炳璿身在萬曆到崇禎年間，這時朝廷內除了宦官亂政、黨爭的問題外，朝廷外則有遼東和東南沿海外族的侵擾及李自成的民變等問題，<sup>33</sup>政治社會的形勢已危在旦夕。所以，從張炳璿後來以貢士的身分擔任知縣，其後不久就辭官歸隱來看，除了他不喜歡做官的擾攘與明爭暗鬥的個人因素外，政治社會的變動應該也是重要的原因。

### 三、「暫拋舉業」的村居生活

張炳璿〈和王良甫山居詠〉主要描寫王徵「簡而文」的風光以及他的隱居生活，〈村居即事〉則是描寫他自己的村居生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村居／隱居生活描寫的重點。在〈和王良甫山居詠〉一開頭就點出「簡而文」的美好風光：「〔端正好〕雲擁出數峰青，水洗淨雙眉綠，輞川圖一幅重鋪，天然地肺南山塢，穿叫窰樊川路。」「輞川圖」就已概括這是隱居的所在。接著他寫到「簡而文」位於「傍深山尋活水」、「層層綠千章樹」（〔叨叨令〕）之處，王徵在「連雲的架屋，及烏的愛屋，認不定長貧富」的情況下，「要覓安身處」，可喜的是「先生先作主，貯釀泉幾斛，種重思數畝，朝與暮交相顧」（〔朝天子〕）。他要在此「清貧安素業隨緣度」（〔叨叨令〕），而這樣的隱居生活是「平安路」、「仙家樂」：「〔四煞〕我如今聊止足，比他們到有餘，深山卻是平安路，桃源鷄犬仙家樂。」<sup>34</sup>

在張炳璿的書寫中，隱居生活與「酒」是分不開的：

〔四邊靜〕甕頭春多糜少黍，不用行沽前村故都，攜榼招朋，信步盤桓處，莫笑貪杯，真個飲徒，已註上神仙簿。

〔二煞〕睡蘆花落浦紅，喚黃梁鬧曉烏。山家別有朝和暮，穿畦水綠迎春漲。夾岸桃紅過雨初，還遣個奚奴去，緣溪問酒，爛醉前途。

〔三煞〕愛山容翠閣眉稜，導水田翠染襟裾。洞門片片雲歸去，迴船隔槿王

<sup>33</sup> 明中後期政治社會的狀況，可參考楊國楨、陳支平：《明史新編》（臺北：昭明出版社，1999），頁165—214、449—552。

<sup>34</sup> 張炳璿：〈和王良甫山居詠〉，《全明散曲》，頁3558—3560。



猷竹，垂柳遍橋魏野驢，遠遠的來前渡，相逢共話，酒聖溪愚。<sup>35</sup>

這三支曲子是在欣賞美好的風光中與朋友「相逢共話，酒聖溪愚」、彼此「莫笑貪杯，真個飲徒，已註上神仙簿」，或是「遣個奚奴去，緣溪問酒，爛醉前途」，「酒」成為隱居生活中逍遙自在的表現，也使人忘卻世間名利。在〔耍孩兒〕一曲中又云：「猛聽得枝頭鳥喚春歸去，管甚麼高岑白甫，詩狂酒興，一般如利和名免盡追呼。再休提朝參日享千鍾粟，但學取坐臥常攜酒一壺，冷眼把紅塵顧，蝸涎蠻觸，豕豸羊芻。」「高岑白甫」指高適（？—765）、岑參（715—770）、李白（701—762）和杜甫（712—770），皆是唐代有名的詩人，「坐臥」是指陳搏（871—989），他是隱居的高士，常寢居不起。<sup>36</sup>張炳璿不管這些有名的詩人，不提名和利，也不提做官享千鍾俸祿，只願學習陳搏坐臥攜酒，冷眼看紅塵。在這裡，「酒」是和名利相對的，成為拋卻名韁利鎖的媒介。最後曲子的結尾是：「〔尾聲〕松濤聒耳門，杞泉淪臟腑，論修真原不出谿山路，卜芳隣太乙終南青萬古。」<sup>37</sup>在松濤、杞泉、太乙終南山下修養真性。

至於〈村居即事〉，一開頭也先點出村居的風光：「〔北雙調新水令〕蔭長林宛轉繞清涯，小莊兒嵯峨山下。水田通地肺，茅舍賽仙家。綠錦紅霞，幀出幅雲林畫。」張炳璿所住的村莊在嵯峨山下，勝過仙家，是一幅「雲林畫」。村居生活雖「冷淡」但卻「興無涯」，在〔折桂令〕一曲中云：「因此尋冷淡生涯，就水栽荷，帶雨移花，鶯語調簧，莎茵展布，蓮粉堆娃，柳樹下停車繫馬，菜園中蕪子芹芽，香稻胡麻，紫螯紅蝦，珍品味嫌濃，薄酒興無涯。」<sup>38</sup>最後則結束在仕與隱的對照中：

〔離亭宴帶歇指煞〕再休提金鋪珠網鴛鴦瓦，連錢錦障驂騮馬，張著口大誇，看不上五柳莊，玩不盡山陰道，粧不就蘭亭畫，桃源避世人，莘野區田稼，這塔兒要先生會耍，也不和早朝詩，也不作臨江賦，也不講先天卦。紅桃曲塢開，綠水遍橋跨，興來時酌春風醉咱，只這個匝谿山閣苑境兒，直抵多少買花石金谷園兒假。<sup>39</sup>

<sup>35</sup> 張炳璿：〈和王良甫山居詠〉，《全明散曲》，頁 3558—3560。

<sup>36</sup> 《宋史·隱逸傳》。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中國學術類編》），卷四五七，頁 13420—13422。

<sup>37</sup> 張炳璿：〈和王良甫山居詠〉，《全明散曲》，頁 3558—3560。

<sup>38</sup> 張炳璿：〈村居即事〉，《全明散曲》，頁 3561—3562。

<sup>39</sup> 同上。



「再休提」做官的相關事物，不和早朝詩，不作臨江賦，也不講先天卦，而要當個「桃源避世人」，村居美景勝過石崇（249—300）的金谷園。這時的他還未做官，仍在為科考努力，對於這些官場事務、名利爭逐並無切身真實的體驗，只能就一般表面意義書寫，亦步亦趨前人的曲作。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這「暫離的」、「想像的」掙脫名韁利鎖的「村居／隱居」生活，也是他在長期的「詩書債苦」的舉業生活中的一點安慰與抒解。

有學者認為元代的散曲有：「嘆世歸隱、懷古詠史、戀情閨怨、自然山水」等四類題材，<sup>40</sup>而根據學者的統計，《全元散曲》所收 212 位曲家中，有 78 位曲家有隱逸思想的作品，佔全部曲家的三分之一。<sup>41</sup>因此，我們可以說「隱逸」是散曲的重要題材。元代隱逸散曲的內容大致描寫：厭棄世俗功名利祿、歸隱田園、安渡漁樵、暢遊山水、陶醉酒醴以及快活閑逸等方面。<sup>42</sup>在張炳璿的曲作中，除了「安渡漁樵」未見外，其他的內容皆有描寫，但又有些許的差異。在「厭棄世俗功名利祿」方面，雖然他並未作官，但也描寫了與官場連結在一起的功名利祿，以及為追求功名利祿而準備科考的「詩書債苦」，前者應是唱和次韻王九思和王徵曲作的關係，後者則是他個人的生命經歷。在「歸隱田園」方面，他既無官在身，就非一般意義遠離官場的歸隱，而是「想像的歸隱」。在「暢遊山水」上，〈和王良甫山居詠〉一曲則是「耳遊」，非親身遊歷，兩套曲作的撰寫動機都有使人「臥遊」的目的，這應與明人「臥遊」之風盛行有關。而在描寫「陶醉酒醴」方面，亦如隱逸散曲的傳統，他不僅透過酒表現對現實的逃避，也以酒來忘卻科考的失意，當然也有在遨遊山水中，以酒自娛的作用。至於「快活閑逸」，兩套套曲的風格顯得閑逸有餘而快活不足。

我們再從隱逸散曲所使用的人物典故來看，張炳璿完全遵循隱逸散曲的傳統。在「歌頌的隱逸人物」上，有：「桃源路」、「五柳莊」的陶淵明（約 365—427）、「提壺」賣酒的司馬相如（前 179—前 117）、「坐臥」的陳搏等，而在「慨歎的功名利祿人物」則有：「忠貞清高終被貶棄」的伍員（前 559—前 484）、申包胥（生卒年不詳），「功高位隆終被殺戮」的韓信（？—前 196），「富甲天下撒手遺人」的

<sup>40</sup> 趙義山：《二十世紀元散曲研究綜論》，第五章。

<sup>41</sup> 王忠林：〈元代散曲中所表現的隱逸思想〉，《元代散曲論叢》（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頁 33。

<sup>42</sup> 王忠林：〈元代散曲中所表現的隱逸思想〉，頁 26—48。



石崇。<sup>43</sup>比較特別的是他提到：「鳴鷄」的祖逖、「擊筑」的荊軻，這是與王徵監遼海軍務的經歷相呼應的，三人皆是一開始滿懷壯志豪情，但最後卻以失敗收場。前面我們說到張炳璿描寫了與他自身經歷有關的準備科考「詩書債苦」的生活，這也表現在他使用的人物意象上，這與隱逸傳統稍有不同。有才高八斗的詩人：曹植、高適、岑參、李白、杜甫，縱然才能再高，寫出天下名篇，但亦在名利場上追逐成為「夢裡繁華」，還有「蠶粥」辛勤讀書的范仲淹，只能「聊娛」。這些歷史人物都與名利功業連結在一起，是他要逃避與超越的。

另外，從隱逸散曲作家的身分來看，Crump 將元代隱逸散曲作家分為兩類：一是曾居高位而後歸隱的作家，二是仕進無門、未曾進入官場的作家。<sup>44</sup>趙義山則分為「宦吏作家」與「才人作家」，「宦吏作家」又分為「達官顯宦作家」與「下層胥吏作家」兩類。<sup>45</sup>按照他們的分類，張炳璿屬於「才人作家」。<sup>46</sup>「宦吏作家」與「才人作家」的差異在於後者僅僅是依循散曲傳統，所創作的作品屬於一種「想像的歸隱」(imaginary withdrawal)。<sup>47</sup>即他們沒有進入官場，沒有實際的作官經驗，始終流連於鄉野民間或是山林田園，不像被貶官或致仕回鄉的一般意義的歸隱，而僅僅是遵循隱逸散曲的傳統來描寫「隱逸生活」。我們將張炳璿的作品與同是「才人作家」的元代曲家喬吉(1280—1345)比較，可見二人在風格上的差異。喬吉有兩首著名的題名為〈自述〉的小令：

〔綠么遍〕不占龍頭選，不入名賢傳。時時酒聖，處處詩禪，煙霞狀元，江湖醉仙，笑談便是編修院。留連，批風抹月四十年。

〔折桂令〕華陽巾鶴氅踟躕，鐵笛吹雲，竹杖撐天。伴柳怪花妖、鱗祥鳳瑞、酒聖詩禪。不應舉江湖狀元，不思凡風月神仙。斷簡殘編，翰墨雲煙，香滿山川。<sup>48</sup>

曲中充滿對科舉仕途、功名利祿的否定，他把自己定位為「煙霞狀元」、「江湖醉仙」，

<sup>43</sup> 王忠林：〈元代散曲中表現隱逸思想所歌述的人物〉，《元代散曲論叢》，頁 49—87。

<sup>44</sup> James I. Crump, *Songs from Xanadu: Studies in Mongol-Dynasty Song Poetry (San-ch'ü)*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p.44.

<sup>45</sup> 趙義山：《元散曲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修訂本)，頁 141—152。

<sup>46</sup> 按照趙義山的分類，王九思曾官至吏部郎中，屬於「達官顯宦作家」；王徵為府推官，是「下層胥吏作家」。

<sup>47</sup> James I. Crump, *Songs from Xanadu: Studies in Mongol-Dynasty Song Poetry (San-ch'ü)*, p.44.

<sup>48</sup> 隋樹森編：《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頁 575。



既然世俗不認可他的才華，他索性將虛名微利調侃一番，然後寄情詩酒，逍遙餘生，作個「酒聖詩禪」、「江湖狀元」和「風月神仙」，豈不勝過官場上逢場作戲、擔驚受怕的生涯。然而在這狂歌笑談背後，仍有他的傷感與無奈。雖然元末復行科舉，但當政者對漢人的種種打壓，造成多數文人仍然仕進無望。<sup>49</sup>喬吉面對曾經執著的兼善理想與抱負，以遊戲人間的玩世心態來宣洩心中的鬱悶，乾脆徹底揚棄以往所謂的正規道路，以全新的角度賦予自己存在的意義——「批風抹月」的「江湖狀元」，這也使得他的隱逸散曲多了「嘆世」與「玩世」的興味。<sup>50</sup>相形之下，張炳璿雖然身處政治社會動盪不安的明末，但仍然科舉有望，他雖然貶低功名利祿的價值，卻沒有喬吉的豪放豁達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態度，在曲作中對於長年科考未第的狀況也沒有落拓失意的情感表達，反而不斷透露試圖掙脫名韁利鎖，嚮往自在閒適的隱居生活，作品風格顯得閑適有餘而快活不足。

#### 四、結語

張炳璿的兩套套曲：〈和王良甫山居詠〉與〈村居即事〉，寫作的動機都與表哥王徵購地興建隱居住所「簡而文」有關，在王徵的邀約下，先唱和〈山居自詠〉寫了〈和王良甫山居詠〉，其後在此事的感發下，又唱和王九思的〈歸興〉，而成〈村居即事〉。兩套套曲皆是唱和的作品，屬於和韻中的「次韻」，是詩藝較高的和韻法。<sup>51</sup>「唱和」是用詩歌相互酬唱、贈答，是古代文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社交方式，不僅可以增進感情，也可以鍛鍊創作的功力。張炳璿創作的目的很大的成分是自娛，也想達到「臥遊」的目的。從唱和的角度看，能與王徵互相切磋套曲的寫作技巧，另一方面也能達到情感增進的社交目的。

「唱和」有限韻與不限韻兩種，前者的限制較多，比較無法表現創作的才能。

<sup>49</sup> 吳彩霞：〈元代政治中的邊緣人：漢族儒士〉，《孔孟月刊》第40卷第6期（2002年2月），頁36—39。

<sup>50</sup> 關於喬吉散曲的研究，可參考黃敬欽：〈喬吉的萬頃玻璃世界——兼談徐再思散曲〉，《興大中文學報》第3期（1990年1月），頁139—153。張森：〈蒼天負我、我負蒼天——論元曲家喬吉的心態與創作〉，《太原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頁63—68。童秉文：《喬吉與徐再思散曲比較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sup>51</sup> 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辯》將「和韻」分為三種：「按和韻詩有三體：一曰依韻，謂同在一韻中而不必用其字也；二曰次韻，謂和其原韻而先後次第皆因之也；三曰用韻，謂用其韻而先後不必次也。」明·徐師曾《文體明辯》（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卷十六，頁40—41。





而散曲的寫作技巧要求更多，尤其是套曲，它需要專門的技術與訓練，<sup>52</sup>所以要能自出新意，突破原作的格局，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王九思的原作是最好的教材，張炳璿透過唱和，模仿、學習來製作套曲，與王徵兩人互相切磋，也聯絡彼此的情誼。他沒有做官的經驗，還在為科考奮鬥，特別著眼在準備科考的「詩書債苦」中。至於官場，只能就一般的認識來書寫，模擬、學習王九思套曲的痕跡明顯，一方面是受限於官場經驗的缺乏，另一方面也與套曲高度的寫作技巧要求有關。長期的舉業生活，使他羨慕王徵的隱居生活，因此高舉隱居的價值，他試圖掙脫名韁利鎖的束縛，試圖突破傳統讀書人的唯一價值，但似乎也只能在紙上談超脫，想像暫離舉業的村居／隱居生活。

張炳璿的兩套套曲，透過唱和，學習、模仿王九思的作品，雖然繼承有餘而創新不足，<sup>53</sup>但因人生經歷的不同，仍有可觀之處。由於他沒有實際的仕宦經歷，只能就普遍意義的仕與隱、「想像的歸隱」來創作，亦步亦趨王九思的作品，曲作風格顯得平淡自然、閒適自在。在主題內容、人物意象與情感思想的描寫上除了遵循隱逸散曲的傳統外，亦能抒發個人情志，充分展現隱逸散曲的風致，在衰微的晚明散曲史上，尤其是關中散曲史中，仍有其意義與價值。

---

<sup>52</sup> 王九思致仕歸鄉後也花了三年的功夫學習散曲創作。明代曲論家何良俊（1506—1573）云：「王漢陂欲填北詞，求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曲論》（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頁9。

<sup>53</sup> 前面提到劉英波認為王徵與張炳璿的曲作表現出「承傳、自娛、創新的特點」，《明代『吳中』『關中』散曲史論》，頁162—166。「創新」指的是王徵曲作對天主教術語的融入，依筆者的研究，張炳璿的曲作則承傳有餘，但創新不足。



## 徵引文獻

### 一、傳統文獻

- 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中國學術類編》）。
- 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中國學術類編》）。
- 《咸陽經典舊志稽注》編輯委員會編：《清宣統·重修涇陽縣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咸陽經典舊志稽注》）。
- 《咸陽經典舊志稽注》編輯委員會編：《清光緒·三原縣新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四部叢刊》）。
- 明·徐師曾：《文體明辯》（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 明·何良俊：《曲論》（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 明·文徵明：《甫田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明·胡直：《衡廬精舍藏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明·王徵撰；林樂昌編著：《王徵全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 二、近人論著

- Berger, Arthur Asa, *Cultural Criticism: A Primer of Key concept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5).
- James I. Crump, *Songs from Xanadu: Studies in Mongol-Dynasty Song Poetry (San-ch'ü)*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 王忠林：《元代散曲論叢》（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何炳棣著，徐泓譯注：《明清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宋伯胤：《明涇陽王徵先生年譜》（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隋樹森編：《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

楊國楨、陳支平：《明史新編》（臺北：昭明出版社，1999）。

趙義山：《二十世紀元散曲研究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趙義山：《元散曲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修訂本）。

劉英波：《明代『吳中』『關中』散曲史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

盧前輯：《飲虹移所刻曲》（臺北：世界書局，1961）。

謝伯陽編：《全明散曲》（濟南：齊魯書社，1994）。

吳彩霞：〈元代政治中的邊緣人：漢族儒士〉，《孔孟月刊》第40卷第6期（2002年2月），頁36—39。

張淼：〈蒼天負我、我負蒼天——論元曲家喬吉的心態與創作〉，《太原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頁63—68。

曹淑娟：〈晚明文人的休閒理念及其實踐〉，《戶外遊憩研究》第4卷第3期（1991年9月），頁35—63。

陳忠和：〈晚明山水小品中遨遊型態與臥遊型態的真偽辨析〉，《興大人文學報》第36期（2006年3月），頁283—324。

黃敬欽：〈喬吉的萬頃玻璃世界——兼談徐再思散曲〉，《興大中文學報》第3期（1990年1月），頁139—153。

葉國良：〈中國文學中的臥遊——想像中的山水〉，《政大中文學報》第13期（2010年6月），頁177—193。

蔡淑閔：〈失落與轉化——從王徵唱和王九思套曲比較二人之仕隱生活〉，《遠東通識學報》第31期，2023年1月，頁27—51。



童秉文：《喬吉與徐再思散曲比較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



